

特大以上城市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的 变动趋势与脱钩分析

叶文显¹ 曾绍龙²¹

(1.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2.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人口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集聚。选取我国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使用 Tapio 脱钩模型、泰尔指数分析这些城市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与脱钩情况。结果发现:①研究期内,城市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存在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而超大城市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③深圳、广州、西安等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而重庆、北京、南京等城市的人均 GDP 增幅明显,从短期看具有较大的人口集聚滞后效应;长沙、深圳、郑州等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远大于人口比重,从长期看具有较大的人口集聚增长潜力。④整体上,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脱钩状态良好,尤其是四大分区中的西部、中部和七大分区中的华北、华南、华中、西南的脱钩状态较好,具体包括北京、深圳、上海等 14 个城市。

【关键词】:特大以上城市 人口集聚 变动趋势 经济增长 脱钩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22)09-1063-08

0 引言

人口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集聚。随着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城市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凸显,城市人口逐渐向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的三大中心城市群和六大核心城市集聚^[1],如东部的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中西部的重庆、成都、郑州、长沙、西安、武汉,人口分布总体呈现“3+6”的格局特征。作为“3+6”人口分布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北京、上海、广州等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在我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0 年,21 个特大以上城市以约占全国 3.4%的土地面积承载了 20.7% 的全国人口,并实现了约占全国 32.8% 的经济总量。人口集聚给特大城市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日趋加快,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退,经济增速也将有所放缓^[2]。那么,作为我国城市人口集聚的典型代表,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是否依然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

¹**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ND0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8ZDA070);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编号:SSY20TD01)。

作者简介:叶文显(1982-),男,湖北省武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曾绍龙(1979-),男,江西省宁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金融。

否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脱钩?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多维度探讨了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人口集聚可促进经济增长。如,Abel等^[3]运用城市生产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每增长1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Baldwin等^[4]实证发现,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人口空间集聚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增长;Fan^[5]实证研究表明,高密度的人口分布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杨东亮等^[6]构建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OLS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省级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宋宝琳等^[7]选取京津冀地区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后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人口集聚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②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或促进作用不显著。如,Haan等^[8]经过实证后发现,人口集聚会增加城市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Jones^[9]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口集聚会显著削弱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劳动生产率;Henderson^[10]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最优规模;曾永明等^[11]认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正向的集聚效应和负向的拥挤效应,当拥挤效应起主导作用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抑制作用。③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如,Brülhart等^[12]运用OLS和GMM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活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集聚只会有一定的经济水平上推动GDP增长,且集聚效应满足威廉姆森假设;Nkalu等^[13]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城乡关系与城市群的动态效应,结果发现城乡人口增长对城市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证实了威廉姆森假说的有效性;陆旸^[14]选取118个国家间隔10年的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首位值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首位值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王智勇^[15]采用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GMM模型,结果发现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

综上,尽管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是其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已有成果的研究范围多为一般地级市,而较少涉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事实上,人口集聚在给特大以上城市带来集聚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糟糕的拥挤效应^[16],人口集聚是否会显著促进特大以上城市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而较少关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事实上,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不一致性和人口滞后效应^[17,18],研究两者之间的脱钩效应十分必要。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21个特大以上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变动趋势与脱钩趋势,以期为我国特大以上城市制定合理的人口集聚政策,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范围与指标选取

1.1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21个特大以上城市,具体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深圳、天津、广州7个超大城市和武汉、东莞、杭州、南京、青岛、长沙、郑州、大连、西安、佛山、沈阳、济南、哈尔滨、昆明14个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判断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介于500—1000万人之间,而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则大于1000万人。城市类型的判断依据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将21个特大以上城市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七大区域和四大区域。

1.2 指标选取

从已有文献的选取指标看,经济增长主要采用人均GDP表征,而人口集聚则多采用人口密度、多指标加权求和法和区位商指数、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19,20]等。统计指数表征,考虑到本文主要测度21个特大以上城市的相对人口集聚度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结合指标的可获取性、科学性原则,最终采用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增长。即用地区GDP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采用人口地理集中度表征人口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P_i = \frac{R_i / \sum_{i=1}^{21} R_i}{M_i / \sum_{i=1}^{21} M_i} \dots\dots\dots (1)$$

式中: P_i 、 M_i 和 R_i 分别为城市 i 的人口集聚度、城市土地面积和年末常住人口数,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年度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时间为 2011—2020 年。

2 研究方法

2.1 Tapio 脱钩模型

鉴于 Tapio 脱钩模型具有独特的时间演化分析优势和具有不同量纲的指标分析特点^[21],本文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进行脱钩分析,计算公式为:

$$T_i^a = \frac{\Delta P_i^a / P_i^b}{\Delta G_i^a / G_i^b} \dots\dots\dots (2)$$

式中: T_{ai} 为城市 i 在第 a 时期的脱钩系数; ΔP_{ai} 和 ΔG_{ai} 分别为城市 i 在 a 、 b 期间人口集聚度与人均产值的变化量; P_{bi} 和 G_{bi} 分别为城市 i 在第 b 时期的人口集聚度和人均产值。根据脱钩系数的取值范围、人口集聚与人均产值的变化情况,将脱钩状态划分为 8 种类型。

2.2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既是衡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及其来源的重要指标,也是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衡量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本文采用泰尔指数 R 总进行测度,并将 R 总指数分解为区域间差异 R_L 和区域内差异 R_V 。计算公式为:

$$R_{\text{总}} = \sum_j^n \left(\frac{P_j}{P} \times \ln \left(\frac{P_j / P}{G_j / G} \right) \right) = \overbrace{\sum_k^n \left(\frac{P_k}{P} \times \ln \left(\frac{P_k / P}{G_k / G} \right) \right)}^{R_L} + \overbrace{\sum_k^n \frac{P_k}{P} \sum_j^d \left(\frac{P_{kj}}{P_k} \ln \left(\frac{P_{kj} / P_k}{G_{kj} / G_k} \right) \right)}^{R_V} \dots\dots\dots (3)$$

式中: k 和 j 分别为第 k 个区域和第 j 个城市; n 和 d 分别为区域个数和某区域的城市个数; P_j 和 P_{kj} 分别为城市 j 和区域 k 中城市 j 的人口集聚度; P_k 和 P 分别为区域 k 的人口集聚度总和与所有城市的人口集聚度总和; G 为人均 GDP,公式中下标含义与人口集聚度 P 相同,不再赘述。

3 结果及分析

3.1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运用公式(1)计算我国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并进行排序。运用四分位数法对 21 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及人均 GDP 排名进行划分,排名第 11 位的为中位数,排名 1—5 位、6—10 位、12—16 位和 17—21 位的城市分别对应“高”“较高”“较低”

和“低”4个档次。①从人口地理集聚度看,深圳、上海、广州、佛山和东莞为典型的高人口集聚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广东省为典型的高人口集聚省份,哈尔滨、重庆、昆明、杭州和大连为典型的低人口集聚城市。2020年,深圳的人口地理集聚度为9.92,而哈尔滨为0.21,前者是后者的47.24倍。②从经济增长的人均GDP来看,北京、深圳和广州为典型的高经济增长城市和经济富集区,哈尔滨、重庆、西安和昆明为典型的低经济增长城市和经济欠佳区。2020年,北京的人均GDP为16.49万元,而哈尔滨为5.18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18倍。由此可知,21个特大以上城市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两级分化严重。从各年度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看,2011—2020年21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口集聚高的城市通常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7个超大城市的相关系数同样表明,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个特大城市的相关系数表明,虽然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可能存在城市规模方面的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特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17个城市(除去4个直辖市)在各省内的GDP比重均值与人口比重均值看(图1),西安和哈尔滨分别以24.4%和29.6%的省内人口比重在17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中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成都、武汉和沈阳,其省内人口比重均超过18%,而佛山、东莞、济南和青岛的省内人口比重均未超过10%。GDP省内比重方面,哈尔滨、武汉、成都和西安分别以37.8%、36.1%、35.0%和33.3%的GDP比重高居17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前四名,其比重皆超过33%,为典型的GDP强省会特大以上城市。从GDP比重与人口比重的内在关系看,17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省内GDP比重均大于人口比重,说明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均有一定的增长潜力。长沙、深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的省内GDP比重远高于人口比重,这些城市未来可能会吸引大量的人口聚集,直至人口比重接近GDP比重。需要指出的是:受户籍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四大直辖市中的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自2015年也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2020年常住人口为1386万人,略高于2011年;重庆是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2011—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长了约26万人,增长势头明显,2020年常住人口为3205万人,居特大以上城市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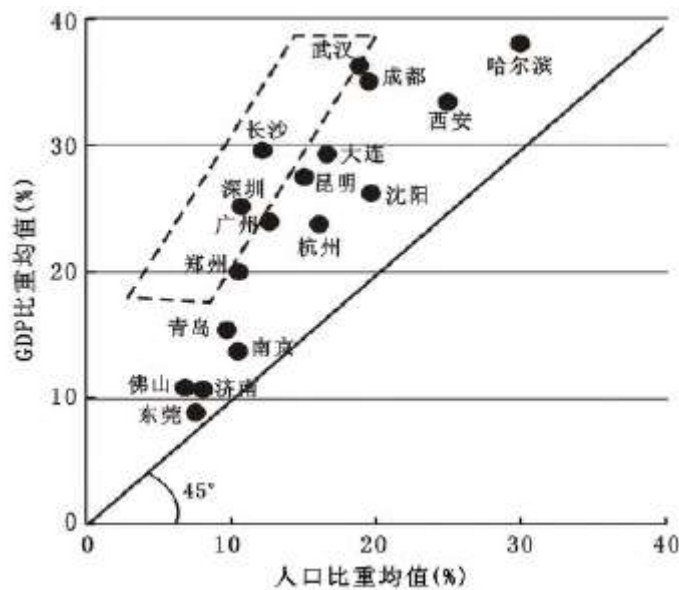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0年17个城市的GDP比重均值与人口比重均值散点图

3.2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从人口集聚的相对变动趋势看,2011—2020年21个特大以上城市的平均增幅为1.92%,其中: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1.09%,特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2.33%,特大城市的平均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从21个特大以上城市的测度结果看,超大城市中深圳和

广州的波动尤为明显,增幅分别高达 38.3%和 20.6%,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超大城市,而其他超大城市的波动呈负增长趋势;特大城市中西安、长沙、郑州和杭州的增幅超过 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特大城市,而哈尔滨和济南的降幅超过 10%,大连、青岛、沈阳和南京的人口集聚呈负增长趋势,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滞后型特大城市。从四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变动趋势看,中部、西部、东部和东北的变动幅度分别为 10.6%、2.2%、-2%和-11.7%,中部增长明显,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区域;东北降幅明显,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滞后型区域;西部和东部则分别呈小幅增长和下降趋势。四大地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中部>西部>东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从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变动趋势看,华南、西北(仅含西安)和华中增长明显,其增幅超过 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增长型区域;华东和西南出现 10%以内的降幅;华北和东北的降幅超过 10%,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滞后型区域;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西北>华南>华中>西南>华东>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

从人均 GDP 的变动趋势看,2011—2020 年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63.80%,其中,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74.23%,特大城市的平均增幅为 58.58%,超大城市的平均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从 21 个城市的测度结果看,超大城市中重庆和北京的波动尤为明显,其增幅分别高达 122.8%和 90.9%,为典型的经济增长型超大城市,而其他超大城市的增幅介于 37.3%—80.8%;特大城市中南京、昆明和武汉的增幅均超过 90%,为典型的经济增长型特大城市,而沈阳、大连、哈尔滨和佛山的增幅均低于 40%,为典型的经济增长滞后型特大城市。从四大分区的人均 GDP 变动趋势看,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的变动幅度分别为 106.5%、101.2%、71%和 7.7%,东部和西部的增长明显,为典型的经济增长型区域,而东北仅增长了 7.7%,为典型的经济增长滞后型区域,四大分区的人均 GDP 增幅呈“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从七大分区的人均 GDP 变动趋势看,华东和西南的增幅均超过 100%,为典型的经济增长型区域,华中、华北和西北的增幅低于 90%;华南和东北的增幅仅为 42.3%和 7.7%,为典型的经济增长滞后型区域,七大地区的人均 GDP 增幅总体呈现“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南>东北”的格局特征。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的人口集聚状况明显不一。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集聚差异。从四大分区的测度结果来看,除 2020 年外,区域内差异基本维持在 0.16—0.17,区域间差异维持在 0.05—0.07,泰尔指数维持在 0.22—0.24,区域内差异明显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 3 个地区,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差异区域;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小,为典型的人口集聚低差异区域。四大地区的人口集聚差异总体上呈现“东部 $\geq$ 西部 $\geq$ 中部 $\geq$ 东北”的格局特征。从七大分区的测度结果来看,除 2020 年外,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大致相当,两者基本都维持在 0.11—0.13,且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泰尔指数维持在 0.22—0.24。华东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 5 个地区,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差异区域,其次是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小,为典型的人口集聚低差异区域。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差异总体上呈现“华东 $\geq$ 西南>华南>华中>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

3.3 城市维度的脱钩趋势分析

从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脱钩状况看,除 2020 年外,绝大部分城市的脱钩状态为“类型 1”和“类型 2”,各年度脱钩理想类城市所占比重介于 86%—100%,代表性城市包括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等 14 个城市,包括 6 个超大城市和 8 个特大城市,说明这些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处于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或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表现为人口集聚脱钩效应的优势城市。具体来说,东莞和南京的脱钩类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其脱钩状态始终为最理想的“类型 1”,说明这 2 个城市在抑制人口集聚的同时实现了人均产值的大幅增长;北京、上海和重庆的脱钩状态由“类型 2”转变为“类型 1”,即从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演变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说明这 3 个城市发生了从“人均产值增速明显快于人口集聚”的同向增长型到“人口集聚下降、人均产值继续增长”的单向增长型演变;深圳、佛山、杭州、郑州、广州和昆明的脱钩状态由“类型 1”转变为“类型 2”,即从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演变为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说明这 6 个城市发生了从“人口集聚下降、人均产值增长”的相向型增长模式到“人口集聚缓慢增长且增速始终低于人均产值”的同向型增长模式演变;济南、武汉和成都的脱钩状态呈现“类型 1”和“类型 2”的强弱脱钩交替式演变,总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波动,说明这 3 个城市的人口集聚状况并不稳定,但人均产值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理想状态。

除 2020 年外,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至少出现了 1 个年度的不理想情形,脱钩效应欠佳。其

中,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和哈尔滨均出现了1个年度的不理想状态,如天津、长沙和西安分别在2015年、2018年和2019年出现了脱钩“类型6”的不理想状态,说明这3个城市在上述年度的人口集聚增速明显快于人均产值,出现了扩张负脱钩的不理想状态;哈尔滨在2016年出现了脱钩“类型4”的强负脱钩状态,即在人口集聚上升的同时,人均产值出现了下降趋势;青岛在2019年出现了脱钩“类型5”的弱负脱钩状态,即人均产值的降速明显快于人口集聚。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出现了多个年度的不理想情形,如沈阳在2014年、2016年和2017年多次出现了“类型5”的弱负脱钩状态,大连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出现了“类型4”和“类型5”的不理想状态,在上述年份沈阳和大连的人均产值均呈现下降趋势,而人口集聚则出现了提升或下降趋势,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不理想状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以前常住人口的年度小幅波动相比,2020年绝大部分特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均出现了较大波动,受此影响,许多城市2020年的脱钩状态相对于2019年有了明显改变。

3.4 区域维度的脱钩趋势分析

除2020年外,四大分区中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脱钩状态均由“类型1”演变为“类型2”,即由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演变为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东部地区在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两次“类型4”的强负脱钩状态,即人口集聚快速上升的同时出现了人均产值下降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速增长与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东北地区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出现了“强负脱钩”和“衰退脱钩”的不理想状态,即在人口集聚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均产值下降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

七大分区中,华北、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状态较好,除2020年外,上述地区的脱钩状态始终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或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其中,华北和西南地区以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为主,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抑制与经济发展增长型区域。华南和华中地区以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为主,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小幅提升与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型区域。华东、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脱钩状态稍差,其中,华东地区在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弱负脱钩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抑制与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东北地区在2016年和2017年出现了“类型4”和“类型3”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发展滞后型区域,而西北地区在2019年出现了扩张负脱钩的不理想状态,表现为典型的人口集聚高速增长型区域。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现大幅波动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脱钩类型在2020年发生了较大变动。

4 结论、启示与讨论

本文选取我国21个特大以上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和泰尔指数定量测度了这些城市的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变动趋势与脱钩趋势。主要结论如下:①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正相关关系,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存在调节效应,当城市常住人口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西安和哈尔滨为典型的人口兼GDP强省会特大城市,成都和武汉为典型的GDP强省会城市。17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省内GDP比重均大于人口比重,这些城市均有一定的人口增长潜力,尤其是长沙、深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的增长潜力较大。③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大于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中深圳和广州的人口集聚增幅尤为明显,特大城市中西安、长沙、郑州和杭州的人口集聚增幅明显。四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东北”的格局特征,七大分区的人口集聚增幅总体呈现“西北>华南>华中>西南>华东>东北>华北”的格局特征。④超大城市的人均GDP增幅明显大于特大城市。重庆、北京、南京、昆明、武汉、上海和成都的人均GDP增幅均超过80%,表现为典型的经济增长型特大以上城市。四大分区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增幅明显;七大分区中,华东和西南地区的人均GDP增幅明显,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增幅较小。⑤大部分城市处于最(较)理想的脱钩状态,尤其是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等14个城市。各年度脱钩理想类城市所占比均超过86%,四大分区中西部和中部的脱钩状态较好,而七大分区中华北、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脱钩状态较好。

鉴于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正相关关系,且17个非直辖特大以上城市的省内GDP比重均大于其人口比重,说明除上海、北京等城市应限制人口户籍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应进行合理的规划引导,重点

关注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特大以上城市,短期内应继续扶持深圳、广州、西安、长沙、郑州、杭州等人口集聚高速增长城市,由于惯性效应,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短期内还会持续增长;中期内要重点支持重庆、南京、昆明、武汉、成都等经济高速增长城市,由于人口滞后效应,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中期内将会有所增长;长期内应积极挖掘长沙、深圳、郑州、广州和武汉等城市的人口潜力,这些城市的省内 GDP 比重远大于人口比重,具有较大的人口增长潜力。根据各城市的脱钩状况,北京、深圳、东莞、佛山、济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郑州、广州、成都、重庆和昆明等 14 个城市的脱钩状态较好,可进一步适度扩展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天津、长沙、西安、青岛、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的脱钩状况至少出现了 1 个年度的不理想情形,如天津、长沙和西安应适度控制人口集聚增速,以保证与适宜的经济增速相协调;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青岛、沈阳、大连和哈尔滨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速,以缓解人均产值下降的不利影响。

本文从城市维度和区域维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 21 个特大以上城市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和脱钩趋势,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人口比重与 GDP 比重、人口集聚增幅与人均 GDP 增幅的内在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我国特大以上城市制定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但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文研究范围局限于典型的特大以上城市,而没有涉及一般的地级市;对于不同的特大以上城市,如何结合具体城市特点推动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也较少涉及。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或人口停滞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将更加明显,GDP 增速可能会进一步趋缓,居民收入增长也将相应放缓,消费低迷可能随之产生,当不能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时,居民消费势必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促进各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各特大城市的居民消费?如何在城市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资源?这些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张伟丽,晏晶晶,聂桂博.中国城市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1,35(2):76-87,127,128.
- [2]都阳,封永刚.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J].经济研究,2021,56(2):71-88.
- [3]Abel J R,Dey I,Gabe T M.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Human Capital[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2,52(4):562-586.
- [4]Baldwin R E,Martin P.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J].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2004,(4):2671-2711.
- [5]Fan C C.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J].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5,57(2):295-311.
- [6]杨东亮,李朋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9,41(3):28-37.
- [7]宋宝琳,周国富,张春红,等.财政收入、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0,36(3):100-103.
- [8]Haan A D,Rogaly B.Labour Mobility and Rural Society[M].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2.
- [9]Jones C.R & D-Based Models of Economics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4):759-784.
- [10]Henderson J V.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4):640-656.

-
- [11]曾永明,张利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理论与检验——中国256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实证:2001—2014[J].企业经济,2017,36(7):141-150.
- [12]Brülhart M,Sbergami F.Agglomeration and Growth:Cross-Country Evidence[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65(1):48-63.
- [13]Nkalu C N,Edeme R K,Nchege J,et al .Rural-Urban Population Growth,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What Does Williamson-Kuznets Hypothesis Say?[J].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19,54(8):1247-1261.
- [14]陆旸.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发展:存在一种特定模式吗?[J].人口研究,2021,45(4):114-128.
- [15]王智勇.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对威廉姆森假说的一个检验[J].南京社会科学,2018,29(3):60-69.
- [16]何文举,张华峰,陈雄超,等.中国省域人口密度、产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基于集聚经济、拥挤效应及空间效应的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19,35(2):207-225.
- [17]王胜今,王智初.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J].人口学刊,2017,39(6):43-50.
- [18]向华丽,秦尊文,付宇.经济空间集聚背景下的人口集聚滞后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理论月刊,2019,(6):114-122.
- [19]刘永旺,马晓钰,杨瑞瑞.人口集聚、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交互影响关系基于面板协整和PECM模型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9,43(3):90-101.
- [20]肖周燕,沈左次.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时空演化及关联性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2):1-8.
- [21]何静,汪侠,刘丹丽,等.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发展与多维贫困的脱钩关系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5):1189-1207.